

## Han: Founding and Canonization

### 1 Most important classicists of Western Han:

漢書，“楚元王傳”：

贊曰：仲尼稱「材難，不其然與！」自孔子後，綴文之士眾矣，唯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

2. Liu Bang not learned, he was a man of action, as were his associates, so he needed specialists to organize his administration. Shusun Tong 叔孫通(d. 188 BC) devised the ritual system for early Han:

漢書：「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

a. His ritual system was based on ancient rites and new Qin ceremoniess: 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 ....叔孙通颇有所增益灭损，大抵皆袭秦故。

### 3 Canonization 文本正典化 or 法定化

-140 BC Han Wudi ascended the throne 即位in 140 BC and he fired his scholarly advisors who followed Legalism and diplomatist thinking 纵横家。

-136 BC, established 五经博士。

-135 His mother 窦太后died; she was a follower of Daoism, so after her death he was free to openly adopt Confucianism.

-124 BC established 五经博士弟子, and made excellence in classical study the key to recruitment in the bureaucracy. (陳鴻森believed that the 五经博士were established only this year, along with disciples).

-Canonization means to select a group of texts to be authoritative, to be the standards. Prioritizing Confucian classics also meant that the government was able to control texts of other philosophical schools since they could exclude them from the canon.

Sima Qian and "Grove of Confucians"儒林列传。

1. Sima Qian followed father's command to complete father's history. So he chose castration 宫刑 over death sentence.

2. Circulation of Shiji史记during Western Han very limited, perhaps forbidden.  
problem of 班马异同: my study of 匈奴传:

a. language of Hanshu version is more archaic or old fashioned than the language of Shiji. The principle to use in this cases is "lectior difficilior potior" (the reading that is

difficult is stronger)

"The Dutch humanist Desiderius Erasmus (1466-1536) was the first to introduce the principle of *lectio difficilior potior* to textual criticism. The Latin phrase means that a textual variant that is more difficult, is stronger. Erasmus had discovered that copyists tended to make difficult texts simple; the opposite rarely happened. He deduced that if two manuscripts rendered the same section differently, the more difficult variant was to be preferred. (Of course this rule of the thumb only applies when both variants are equally logical and grammatically plausible, because otherwise, unusual expressions would be accepted as authentic only because they are difficult.)"

b. During Han Sima Qian composed the Biography of the Xiongnu."

c. Ban Gu copied it for the first part of his own biography.

d. During Han, Shiji was not available, so somebody copied from Ban Gu's biography.

e. In the process of copying, the scribe simplified the language to modernize it.

f. So although the "Biography of the Xiongnu" was originally composed by Sima Qian, the text of the Hanshu preserves the original wording, and should be used as the base text 底本。

3. Sima Qian's biography of Confucian scholars lacked many details (as compared to 班固儒林传).

a. He wanted to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private scholarship 私学 for the sake of learning; Ban Gu preferred official scholarship 官学 that led to a career and money. This supported the regime.

b.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Dao De Jing:

(The use of what has no substantive existe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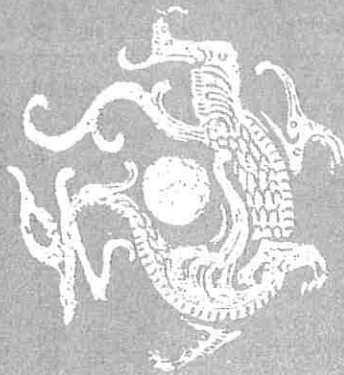
The thirty spokes unite in the one nave; but it is on the empty space (for the axle), that the use of the wheel depends. Clay is fashioned into vessels; but it is on their empty hollowness, that their use depends. The door and windows are cut out (from the walls) to form an apartment; but it is on the empty space (within), that its use depends.

Therefore, what has a (positive) existence serves for profitable adaptation, and what has not that for (actual) usefulness.

# 中国经学史·秦汉魏晋卷

经与传

HISTORY OF  
CHINESE CLASSICAL SCHOLARSHIP, VOL. 2.  
QIN-HAN, WEI-JIN:  
CLASSIC AND COMMENTARY



[美] 韩大伟 (David B. Honey) 著  
黄笑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本经典的流播过程堪称具有典型意义，它们反映了私藏古籍、偶然发现以及口头传授这三个主要的传播环节。

## 第一节 文本传播：以《尚书》为例

《尚书》很好地反映了当时的人们是如何对古籍进行复兴重建的。伏生采用了两种形式去传播《尚书》，第一种方式是口授，如下：

征之，老不能行，遣太常掌晁错往读之。年九十余，不能正言，言不可晓，使其女传言教错。齐人语多与颍川异，错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属读而已也。<sup>①</sup>

第二种方式是文本传播。人们在伏生家的墙壁里找到了破烂不堪的《尚书》，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写道：

秦燔书禁学，济南伏生独壁藏之。汉兴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之间。<sup>②</sup>

陈安妮（Anne Cheng）针对此写道：

这暗示了不论是口授的还是以书写形式传播的，都出自

① 《史记》中张守节的评论曾引用了《诏定古文尚书序》中的若干段落。

②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第1706页。

同一源头和同一时间段。<sup>①</sup>

然而前者包含“齐论语”，后者则包含“鲁论语”。齐地的胡人都传承了齐地的方言，他于前150年前后帮助公羊氏转写了《论语》。<sup>②</sup>

伏生的《古文尚书》藏于皇室书阁之中，晁错根据他女儿的翻译以当时的语言转写了《尚书》，这一转写版本显露出某种新兴学派的特质。以新的语言和观念对《尚书》进行全新的语内翻译和转写并不代表伏生的《尚书》就是古旧的版本。我将在后面章节中分析与探讨今古文之争，但在这里有必要将争论的源头追溯至秦朝。那个时代蒙受了世人太多的诽谤与污蔑，以至于直到今天在那个朝代萌生的诸多文化现象及源头仍被人们忽略。正如陈中凡所指出的那样，秦始皇规范统一了各地的书写形式，促使秦隶成为通行的字体，所有那一时期的文本必须以当时的规范字体进行书写，之前流传下来的古籍、注释及其注解必须以时的新语言加以重新书写。<sup>③</sup>这一合理要求成为新旧文本之争的原动

① Xinzhong Yao, ed., *Routledge Curzon Encyclopedia of Confucianism*, 2 vols.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3), p. 79.

② Xinzhong Yao, ed., *Routledge Curzon Encyclopedia of Confucianism*, 2 vols.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3), p. 79.

③ 读者可参见陈中凡《秦汉今文经师之方士化》，收录于《陈中凡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第95~99页。在西方也存在相似的例子，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学者们选取了一部分古代文本，将过时的字体与表达替换成当时普遍使用的词语和书写方式。L. D. Reynolds, N. G. Wilson, *Scribes and Scholars: A Guide to the Transmission of Greek and Latin Literature*, 3<sup>rd</sup> e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1), pp. 8-9.

力，它实际上也促发了之后的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争，而内在原因则在于使用时人所习惯的语言文字是必要的，加之西汉末期与东汉时期的政治形势、学者风尚以及诠释潮流。

第二种《古文尚书》的文本发现于孔子后裔所住房屋的旧墙之中。当代学者李学勤推断这一版本是以齐鲁之地的字体进行书写的，成书时间应为战国晚期，其间夹杂着些许楚地文字，因为齐鲁曾受楚文化影响。<sup>①</sup> 根据孔子第九代子孙孔鲋（前 264～前 208）的《孔丛子》所载，这一版本属于私藏手稿的一部分，《诗经》《礼记》以及其他一些经典文本也同属这类，我将会在下文中详加分析。这些经典最终流传到了孔安国（前 156～前 74）那里。根据司马迁所书，他是孔子第十一代子孙，陆德明（556～627）则认为应为第十二代。

现摘录《孔丛子》中若干语句，如下：

陈余谓子鱼曰：秦将灭先王之籍，而子为书籍之主，其危矣。子鱼曰：吾不为有用之学。知吾者，惟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然顾有可惧者，必或求天下之书焚之，书不出则有祸。吾将先藏之以待其求，求至无患矣。<sup>②</sup>

这部选集包含了孔藏给孔安国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孔

藏将时人对古籍的挖掘和发现归为天意。<sup>①</sup>

## 一 《古文尚书》

班固在《汉书》中认为时人对《尚书》的编订始于伏生始文本的复兴：

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才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sup>②</sup>

从那个时代文本批评发展的观点出发，很多事情是值得的。首先，大量的古代文献被挖掘出来，这些珍贵的古籍变手可得。编订古文献的需求就是出自个别学者的兴趣，同时源于官方政策。其次，孔安国搜集并甄别了不同版本的《尚书》，人们将出土的古籍献给皇上，朝廷会对这样的挖掘上作提供一定的奖赏和资助，也就是说，这实际上并非一种纯学术行为，而是出于某种政治动机。

① 《中国子学名著集成·孔丛子》第 3 卷下，台北，中国子学名著集成编印基金会，1977，第 4 页。〔希伯来〕姚弗·阿瑞尔（Yoav Ariel），*K'ung-Ts'ung-Tzu. A Study of Chapters 15-23*，剑桥大学出版社，第 107 页。

译者注：

〔希伯来〕姚弗·阿瑞尔（Yoav Ariel）是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哲学与东亚学教授，他的学术兴趣包括：汉学、中国哲学、比较哲学、宗教学以及数字化文明。

②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第 1706 页。

① 见李学勤《论孔子壁中书的文字类型》，《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 264～267 页。

② 《中国子学名著集成·孔丛子》第 2 卷中，台北，中国子学名著集成编印基金会，1977，第 27～28 页。

《汉书》记载了刘向对皇室文献古籍的大规模整理、分类和

研究：

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洒语脱简一，召诂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书者，古之号令，号令于众，其言不立具，则听受施行者弗晓。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sup>①</sup>

司马迁在《史记》中增补了关于孔安国的材料，加述了他早期的编辑工作：

自此之后，鲁周霸、孔安国，洛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事。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sup>②</sup>

这一段似乎是在暗示孔安国以他在文本批评和编辑方面的成就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孔安国以今文读之”涵盖了两个步骤：第一步是他以当时的语言文字翻译了《尚书》；第二步是他对自己翻译的文本进行了评论。一个兼具二者的典型例子是《尧典》，詹姆斯·理雅各将“光被四表”译为“皇帝的四

①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第1706页。

②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第3125页。

种极致的特质”。<sup>①</sup>郑玄将“光”解释为“亮”，而孔安国则将其解释为“充”。段玉裁（1735～1815）将这两位早期经学家两种迥异的诠释路径进行了比较：

郑君释以光耀，此就本义释之。伪孔云：光，充也。此就假借释之。用今文注古文也。古今文字异而音义同，伪孔

① 读者可参见〔英〕詹姆斯·理雅各（James Legge）译著《中国经典》（*The Sacred Books of China*）。

译者注：

〔英〕詹姆斯·理雅各（James Legge，1815年12月20日至1897年11月29日），原名詹姆斯·莱格，他出生在苏格兰阿伯丁郡亨得利镇一个富裕的布商家中，亨得利是一个有着优良传道传统的小镇。他于1839年被英国基督教新教派公理宗的伦敦传道会派驻马六甲主持英华书院。1843年英华书院迁往香港，理雅各随之迁居香港获林，任香港英华书院第一届校长。1841年理雅各着手翻译中国经典，1861～1872年相继出版《中国经书》（*The Chinese Classics*）系列（五卷，共八本），包括《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尚书》、《诗经》与《春秋左传》。在此期间获得王韬的协助，难能可贵的是，当1867年理雅各离开香港回苏格兰家乡克拉克曼南郡的杜拉村时，王韬随后也前往苏格兰杜拉村，继续协助他翻译《十三经注疏》，最终于1870年完成《十三经注疏》的翻译。同年，理雅各获得苏格兰阿伯丁大学文学院博士学位，重新回到香港主持英华书馆，并同时担任香港佑宁堂（Union Church Hong Kong）教区牧师。1873年访问中国大陆，拜访了慕维廉、伟烈亚力，在参观天坛时，他强烈地觉得天坛圜丘坛虽作为无偶像崇拜的空间领域却是世界上最神圣的场所，不独脱靴礼拜。1876～1897年，理雅各担任牛津大学第一任汉学教授。1879～1891年相继出版《中国经典》（*The Sacred Books of China*）系列（共六卷），包括《尚书》、《诗经》（与宗教有关的部分）、《孝经》、《易经》、《礼记》、《道德经》与《庄子》。1885年翻译出版《沙门法显自记游天竺事》。1888年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翻译成英文。1897年，理雅各在牛津逝世。他一生著述颇丰，如《致马六甲中国侨民的一封信》（1841），《养心神诗》（1842），《耶稣山上垂训》（1844），《英华通书》（1851），《约瑟略记》（1852），《重修礼拜堂仁济医馆祈祷上帝祝文》（1852），《耶稣门徒信经》（1854），《新约全书注释》（1854），《智环启蒙熟读初步》（1856），《亚伯拉罕记略》（1857），《往金山要诀》（1858），《圣会准绳》（1860），《新金山善待唐客论》（1862），《孔子传》（*Life and Teaching of Confucius*，1867），《孟子传》（*The Life and Teaching of Mencius*，1875），《中国的宗教》（*The Religions of China*，1880）。他曾获得法国汉学界最高奖项——儒莲奖。

训为长。<sup>①</sup>

古典学术语境里的“读”指的不仅是对文本进行简单的朗诵、吟唱和熟读，它实际上包含了一系列注解释活动，针对文本所展开的解析是为了对字词进行正确精准的解读。在上述所举的关于孔安国的例子中，他解读并修饰了“光”在《尚书》中的含义。段玉裁对汉语语境里的“读”进行了解释，尤其是对《尚书》这一代代表着中国古典书写传统的文本中的“读”做了如下注解：

壁中书皆古文，故谓之古文尚书，今文者，汉所习隶书也。以今文读之，犹言以今字读之也……凡古云读者，其义不一：讽诵其文曰读，定其难识之字曰读，得其假借之字曰读，抽续其义而推演之曰读。予国于壁中书兼此四者。<sup>②</sup>

《孔丛子》保留了孔藏写给孔安国的书信，他赞誉了孔安国立足于文本的“读”，并清楚地描述了孔安国所做的一切：

知以今僻古，以隶篆推科斗，已定五十余篇，并为之传。<sup>③</sup>

①（清）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4695页。  
②（清）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4692页。  
③《中国子学名著集成·孔丛子》第3卷下，台北，中国子学名著集成编辑基金会，1977，第4页。

孔藏曾经提及，孔安国受皇上之托为《古文尚书》撰写序论，《尚书序》的前言部分解释了书写的动机、目的和过程，<sup>3</sup>

承诏为五十九篇作传……于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经传，采摭群言，以立训传，约文申义，敷畅厥旨。<sup>①</sup>

孔安国的评论似乎解释了其编辑工作的基础，但真实的原因在此。当代学者虞万里认为传承典籍的最佳方式是师徒间的私教，因为对如何阅读文本进行解释实际上意味着对书写语音和每个字的意思进行解释。这种诠释形态被称为“章句”。<sup>②</sup>但“传”或“记”的书写形式更适合对古籍的浓缩性研究和摘要性总结，例如《礼记》。<sup>③</sup>另一个例子是伏生的《尚书传》，虽然现在已经佚失，但根据清代学者的论证，此书与《记》中那些类似的篇章性质相近，<sup>④</sup>对文本做出单纯的注解

①《尚书正义·尚书序》，1.15a 此序通常被认定为“伪孔本书序”，伪造日期不宜成文于战国晚期，在荀子时代之后，切勿将之与出土于孔壁之中真正的《尚书》相混淆。顾颉、刘焯及刘炫等隋唐时代的学者对《尚书》的训诂注解标志着月的转折，因为他们是基于“伪孔本书序”所进行的研究。王先谦（1842~1917）两卷本《尚书孔传参证》堪称对“伪孔本书序”最具权威的传统研究，请读者王先谦《尚书孔传参证》，中华书局，2011；程元民的《书序通考》则是对其伪性质的反复考证，请读者参见程元民《书序通考》，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7。此观点首次引介于《中国经学史》第1卷，请读者参见该书第八章第六节“子作为文类的语篇注释体”。

②读者请参见虞万里《由清华简〈尹诰〉论〈古文尚书·咸有一德〉之性质》，于《榆枌斋学林》（两卷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第11~36页（与内容甚密之处在第26~27页）。

③读者请参见黄开国《简论伏生与大传》，《经学研究论丛》2000年第8期，第148页。

类并不是“传”的主要文类形式。<sup>①</sup>

虞万里在此并未提及章炳麟富含想象力的解读，但也同样认为“章句”和“传”/“记”有着共同的渊源。在他看来，《古文尚书》里的《咸有一德》并非原文，而系孔安国后来添加，只是借用了某一旧有篇章的名字罢了。<sup>②</sup>《尹诰》原文藏于后世出土的清华简手稿之中。古典文献注解范式的嬗变反映了经学研究由文本真伪之争转向了文类性质与目的之探求。

我将在下文引入《尹诰》与《咸有一德》的英译白话版本，前者被视为原文，后者则被看作注释，若是将二者并置，进行一番比较阅读，我们即可发现二者之间的关联。<sup>③</sup>为方便读者阅读，

① 在西方，拉丁语时期的语法学家普利西安（Priscianus Caesariensis）注意到了评论性解释与文本性注释之间的差别，他在《中世纪读本：语法、修辞与古典文本》一书中这样区分道：“评论性解释意味着释者仅仅对文章的意涵进行阐释，而非文中具体的词汇，文本性注释则表示释者对于二者均做了阐释，故后者也被称为‘解说性注释’，因其对辞章段落进行了字里行间的详尽注解，正如老师出于教育目的对文本所做的细致解说一般。”读者请参见 Priscianus Caesariensis, trans. by Suzanne Reynolds, *Medieval Reading: Grammar, Rhetoric and the Classical Tex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9.

译者注：

普利西安（Priscianus Caesariensis），活动于6世纪前后，是拉丁文语法学家，曾长期在皇宫宫廷中供职。他著有十八卷关于拉丁文语法的文本，为后世学者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研究资料，他的著作也成为中世纪人们学习相关语法知识的教科书。

② 读者请参见虞万里《由清华简〈尹诰〉论〈古文尚书·咸有一德〉之性质》，收录于《榆枋斋学林》（两卷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第11-36页。美国汉学家戴梅可（Michael Nylan）生发了五种理论，试图为那些关于《古文尚书》自相矛盾的文献资料提供一个自圆其说的解释，她在第四种理论中提出，作为人类早期文本的《古文尚书》具有将原文与注解合二为一的折中性质。读者请参见 Michael Nylan, "The ku wen Documents in Han Times," *Yung Pao*, Second Series, 81 (1995): 25-50.

③ 我在此接受了虞万里的抄录、训诂与注释。读者请参见虞万里《由清华简〈尹诰〉论〈古文尚书·咸有一德〉之性质》，收录于《榆枋斋学林》（两卷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第12-19页。

我用黑体字将主要论点标出，如下：

## 尹诰

尹认为汤具有独特唯一的美德。<sup>①</sup>伊尹有感于夏之覆灭慨然说道：“夏自绝于民众，民众遂亦断绝他们与领主之间的联系，没有了民众，夏将无力抗敌。领主若与民众积怨愈深，民众就会以反叛相报，故军攻夏则指日可待，领主为不明白这简单的道理！”伊尹随后对汤进言：“我们可与盟友合作，远走他乡之人意欲归来。”汤长叹道：“苍天啊！我如何庇佑子民？！又将如何迫使我的子民遵从我的命令？！”伊尹说道：“我尊贵的主啊，您必须奖赏他们，您应该封赏于民们黄金、玉石与土地，以使他们满意。”汤听罢此言，遂赐封子民们中央领地。

## 咸有一德

就在伊尹恢复他对臣民的统治之后，他意欲退位，并將权力授予有德之人。他呼号道：“上天啊！天地四时，皆有变更，不可信仰天启，愿独具永恒美德之人享有王权，从而以其永恒之美德永葆王权之光辉！若美德不存，则九州亦将丧尽！夏之君王不行善道，辱蔑神灵，涂炭子民，故人神共愤，天已诛之！今放眼九州大地，愿得一双慧眼明察秋毫，但寻一人身怀美德，可挑重任，成为道之主宰。”惟伊尹与

① 此句广为流传，《古文尚书》将此句转写为“尹和汤都具有纯粹的美德”。关于虞万里对此句的解读，请读者参见虞万里《清华简〈尹诰〉“佳尹既及汤咸又一德”解读》，收录于《榆枋斋学林》（两卷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第1-10页。

汤二人具备这样的美德，可以共同承担上天的意志，接受光荣的使命，部署九州军队，翻开新的历史篇章。上天并无偏袒，但天佑行美德善道之人，故商并未召集普天下之人，而泱泱民众因商王之美德而齐聚门下。只有当道德以某种单一的方式呈现出来时，人们才知道如何规范自己的行为；倘若道德的形式达至两到三种，那么人们就会无所适从。上天依据各人的德行降福祸祉或是灾祸，因此吉与凶适时出现，从不扰乱人们的视听。

现如今，新的君王承担了治理天下的重任，只需施行美德。最重要的是，自始至终地维持永恒不变的美德，每日将之重申。任人唯贤，尤其是在任命高参时，更要选拔贤者。以美德侍奉上天，以予民为本，以谨小慎微的态度面对困境。切记，要维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要确保美德的单一性。美德没有永恒的主人，请向善良的人学习；善行亦无永恒的主人，请与拥有纯粹道德的人并肩。决决子民会异口同声地说：“这些话不愧出自君王之口。”他们还会说：“单一纯粹的道德精神便是君王的精神。”倘若君王真能如此，那么他定可延续前代君王创造的繁荣，使人们长久地安居乐业。

上天啊！在七代祠堂里，我们可以觉察到他的美德；在无数臣民的身上，我们可以体察到他的统治。如果统治者反对人民，那么谁会服从他的命令呢？如果人民反对统治者，那么他们将为谁服务呢？切勿抬高自己，贬低他人。如果布衣百姓不愿尽最大的努力去执行纲领，那么民众的主人可与谁一起实现他的功绩呢？

通过对上述两种文本的比较阅读，我们不难发现，二者唯一的共同点在于不加解释地坚守“纯粹单一的美德”。评注倒是针对这种道德观进行了较为丰富详尽的诠释，却未对文本的其他部分进行拓展性阐释。虞万里认为此种理念回应了尧以粗网替代细网捕鱼的行为，因为这一举动表明他允许一部分动物在皇家狩猎活动中逃脱，他对动物的宽容证明了他的“仁”，所谓“纯粹单一的美德”实则就是“包罗万象的仁的美德”。<sup>①</sup>

由于《咸有一德》与《尚书》中其他文本的语言风格相一致——古典、呆板而又显贵族气，故不少学者合理地推断《咸有一德》应为原书中一则，而非评论性文字。因为倘若某一文本反映了远古时代文雅的语言风格，另一文本则凸显出较晚时期的评论性语体风格，此二者怎么可能出现在同一本书中呢？当然，评注也可能被当成经典。《尚书·洪范》一篇的评注就被视为经典，收录在了《汉书·五行志》之中，如下：

昭帝元平元年四月崩，亡嗣，立昌邑王贺。贺即位，天阴，昼夜不见日月。贺欲出，光禄大夫夏侯胜当车谏曰：天久阴而不雨，臣下有谋上者，陛下欲何之？贺怒，缚胜以属吏，吏白大将军霍光。光时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欲废贺。光让安世，以为泄语，安世实不泄，召问胜。胜上洪范五行传曰：皇之不极，厥罚常阴，时则有下人伐上。不敢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谋。<sup>②</sup>

① 请读者参见虞万里《〈咸有一德〉之“一德”新解》，收录于《榆枋斋学林》（两卷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第37-55页。

②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第1459页。

相较于夏侯胜的语言，评注的语言风格自然更为高贵典雅。所谓“伪古文文献”很可能包含了战国、秦朝及汉代遗留下来的评注，其中自然也不乏一些编造的文本，它们并非化石般的遗迹，而是出现在学者的研究视野之中。暂且不谈这些个别章节的出处，清代的经学家们敏锐地窥见了经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即古文文献越来越受到重视。有意思的是，一方面，清初的学者们猛烈地攻击古文文献资料的真实性；另一方面，他们却愈发地强调这些文献的重要性。

最先开始的是疑古思潮。

北宋经学家吴棫（1100~1154）的《书裨传》引发了人们对《古文尚书》的质疑。朱熹（1130~1200）的思想，连同他的威望，进而在诸多方面加深了人们的质疑，同时也影响了后人对这本古老经典的看法，造成了一系列的历史连锁反应。<sup>①</sup> 阎若璩（1636~1704）在其《尚书古文疏证》中浓墨重彩地书写了清代早期学者群体对《古文尚书》文本性质的探讨及质疑，惠栋（1697~1758）在其《古文尚书考》中则提出了《古文尚书》系东晋伪书这一沿用至今的观点。<sup>②</sup> 清华简手稿中的《尚书》文本似乎证实了前代经学家们的研究结论，李学勤认为这些证据解决了关于伪书的历史疑案。<sup>③</sup>

而后便开始了扬古思潮。尽管伪书一案已成定论，晚清学界

却不时涌现出迥异的声音，这些驳杂于主流观点之中的反调能替伪书翻案，但至少开辟了一方从儒学角度解读文本的余地。如广东经学家桂文焕（1823~1884）在承认《古文尚书》虚的基础上却发现了它的价值与意义，见下文：

古文尚书经注至今日而伪迹昭著，无庸再辨，惟处道未得其宜。乾隆中有奏请废其伪经者。以武进庄侍郎议谓篇中多精理名言，以之进讲最为有益，中止。<sup>①</sup>

桂文焕继承了其师陈澧（1810~1882）对《古文尚书》的论断——“精炼而合理的注释”，陈澧在他闻名遐迩的《读书记》中就《古文尚书》的重要性发表了自己独特的见解。首次发现郑玄的评注不同于孔安国之处，而孔之评注则往往郑之评注。他故而总结道：

盖伪孔读郑注，于其义未者则易之，此其所以不也。伪古文经传可废，二十八篇伪传不可废。<sup>②</sup>

人们不应忘记，宋代的经学家正是从《古文尚书》中汲养为他们的注释寻求文本支持，而非《今文尚书》。<sup>③</sup>

① 读者请参见杨新勋《宋代疑经研究》，中华书局，2007，第199~206页；李学勤《朱熹的尚书学》，收录于《古文文献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239~246页。  
② 读者请参见吴通福《晚出古文尚书公案与清代学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刘起钎《尚书学史》（订补本），中华书局，1989，第279~285页。  
③ 读者请参见李学勤《清华简九篇综述》，《文物》2010年第5期，第51~57页。

①（清）桂文焕：《经学博采录》，台北，明文书局，1992，第12页。  
②（清）陈澧：《陈澧集》（六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97页。  
③ 读者请参见李学勤《朱熹的尚书学》，收录于《古文文献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240~241页。

这种对《古文尚书》价值的重视一直延续到了今日。《尚书》的当代编订者黄怀信有着与陈澧和桂文焕相同的广博胸襟，他的学术观基于中国古典评注的性质，即那些师徒之间世代相传的口头教诲，历经漫长的时间沉淀，最终化为评注的书面版本，走向了一个凝结的终点。那些看似无关甚至与成书年代相冲突的因素，却能在漫长的口耳相传之后被纳入文本。<sup>①</sup>几个颇受欢迎的《尚书》现代译本不加思索地将所谓的“伪古文尚书”理所当然地收入其中，丝毫不计较其真实性问题。<sup>②</sup>

## 二 《今文尚书》

班固开始运用《今文尚书》处理《古文尚书》的文本历史问题，见下文：

秦燔书禁学，济南伏生独壁藏之。汉兴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之间。论孝宣世，有欧阳、大小夏侯氏，立于学官。<sup>③</sup>

此版本被学术教育机构所采用，并以各种编订方式流通于学界。这一现象标志着皇室对此文本的支持，从而也引起了郑玄的极

大关注。我们可从两则官方事例中窥见《古文尚书》的普及：一是刻于175~183年的“熹平石经”，其以欧阳大师的文本为基础；二是240~249年，朝廷刻印了以《古文尚书》为基础的“三体石经”。

班固的《艺文志》详细地阐述了伏生与其弟子对这一普及本所做的注解工作，如下：“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介绍了伏生与弟子如何用那个时代的字体转写孔安国的《古文尚书》，“经二十九卷”介绍了他们对《古文尚书》所做的编辑修订工作，“传四十一篇”记叙了他们对孔安国生平资料的整理，“欧阳章句三十一卷”则是基于伏生对文本的口头阐释与分析所进行的延伸性书写，接下来是“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sup>①</sup>以及“欧阳说义二篇”。<sup>②</sup>最后两篇为极其成熟的传记。某些篇目展现了传记与经典之间的关系，却不涉及对文本的具体分析，如刘向五行传记十一卷与许商五行传记一篇。<sup>③</sup>

此类关于《尚书》（包括《古文尚书》与《今文尚书》）的评注背离了一个涉及注释体本质的基本事实，即最早的注释类作品旨在释读文本。直到时间推移至经学家刘向生活的那个年代，也即东汉末年，方才出现官方钦定的术语“传”，这一文类专注于挖掘经典文本的意涵。至于这种文本批评的趋势究竟是反映了现实生活的需求，还是试图存证历史发展的遗迹，今人尚未可知。回顾历史，韩婴对“传”这一术语的定义及其运用始终是模

① 读者请参见黄怀信《尚书正义·校点前言》，张岂之编《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3页。

② 读者请参见王世舜、王翠叶译《尚书》，中华书局，2012；李民、王健译注《尚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此外，台湾的两个译本还着重呈现之前被略去的《古文尚书》篇章，读者请参见吴瑭编译《新译尚书读本》，台北，三民书局，1977；郭建勋编译《新译尚书读本》，台北，三民书局，2005。

③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第1706页。

① 大夏侯指夏侯胜，小夏侯指夏侯建。

② 欧阳指欧阳生，据班固《汉书·儒林传》记载，他名为和伯，为伏生弟子。程元敏曾在其《尚书学史》中比较大、小夏侯与欧阳生的作品，读者请参见程元敏《尚书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第628~634页。

③ 许商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官僚，曾任职于少府。

校两可的，班固在《汉书·儒林传》中解释道：

韩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为之传。<sup>①</sup>

换言之，“传”侧重于挖掘并展现文本所欲传达的信息，韩婴强调的也正是“传”作为某种工具性文体所拥有的使用价值，至于“传”作为一种媒介的本质，则被略去不谈。但值得深思的是，韩婴为《诗经》所书写的两种“传”——《韩诗内传》与《韩诗外传》则映射出两种截然相反的诠释理念，前者重在注解，后者重在阐发。唯一清晰的是，围绕着《尚书》展开的考据及探讨在西汉时期的文本批评活动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下面，我将以《诗经》为例，详细阐述四个分立的释《诗经》学派之《诗经》学观，并凸显汉代口授传统的重要性。

## 第二节 口头传授：以《诗经》为例

如果说《尚书》作为一种文本是通过“古文”及转写而成的“今文”散播流传的，那么《诗经》的成书及传播则完全依赖于口头传授。或者，至少可以断定，没有具体的史实能够证明《诗经》的成书得益于书面文字的历史沉积。班固曾言：

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汉兴，鲁中公为诗训故，而齐轅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

①（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第3613页。

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sup>①</sup>

不少学者认为，形成于西汉时期的三家诗学派建构了经展历程中的新文本传统，<sup>②</sup>但这种看法仅仅表明文本被与时

①（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第1708页。关于欧美学界对申培、韩婴三家诗的译介与研究，读者请参见 James Hightower, "The Han - Shih Wei and the San Chia Shih,"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1 (1948): 241 Appendix 1, pp. 268 - 278。

译者注：

〔美〕詹姆斯·高托（James Robert Hightower, 1915年5月7日至2006年1月）出生于俄克拉荷马州，高中毕业后进入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学习医学和文学，但他很快发现了对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兴趣。通过阅读庞德（Ezra Pound）的诗歌，他间接地接触到了中国诗歌，出于对中国文学的好奇，他开始学习汉语的中文类课程。1936年毕业后他获得了一年的海德堡大学语言学研究生基金，回国索邦大学学习，在那里，他与文学教授詹姆斯·乔伊斯进行了交流对话；1939年赴美后作为研究生进入哈佛大学远东语言系学习，1940年获得硕士学位；赴北京担任燕京大学中印研究所所长，并着手撰写博士学位论文，他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回到哈佛完成了博士阶段的学习并获得学位。他一度专注于对《诗经》的研究，著有《〈韩诗外传〉的翻译与研究》与《〈韩诗外传〉的应用文学史》，他还曾与叶嘉莹共同编写《中国诗歌研究》。

② 读者请参见 James Hightower, "The Han - Shih Wei - Chuan and the San Chi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1 (1948): 241 - 310; Appendix 1, pp. 268 - 278; 佐仁（Steven Van Zoeren）, *Poetry and Personality: Reading, Exegesis, and Hermeneutics in Tradition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80 - 115); 林《两汉三家诗研究》，巴蜀书社，2006；王礼卿《四家诗会归》（四卷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译者注：

范佐仁（Steven Van Zoeren）所著的《诗与人格：中国古典传统语境中的注解与诠释》（*Poetry and Personality: Reading, Exegesis, and Hermeneutics in Traditional China*）追溯了中国经典诠释学的历史，其所研究的文本早至公元前6世纪。这既不是对诗歌的解读，也不单纯是对历史的回顾，而是试图剖析并总结中国诗的传统及原则。作者追溯了诗歌在中国的文化价值及其与政治和秩序的关系，并了中国古代考试制度及人才选拔方式对诗歌功能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同时还区分了歌在公共场所和私人生活中的不同功用。此书结合了诠释学的相关理论和视角。

地转录成了那个时代的“新”文本，也即浸润着浓厚的汉代书写风格的文本。毛学的创建意味着一种不受益于官方资助的私学传统之诞生，这一学派最终在百家争鸣中脱颖而出。郑玄的《毛诗笺》可谓海纳百川，但关键性的基石依然是毛学，另外三家学派的观点只是有选择性地夹杂其中，因此，毛学成为所谓的正统学术。<sup>①</sup>人们也倾向于将毛诗视为“古文”传统的代表，事实上，这种观念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真正的古文文献并未流传至汉代。<sup>②</sup>这一错误的认知可能是由“古文”一词固有的歧义造成的，因为它也可被理解为古文字文本。清代的经学家似乎认识到了这种语汇上的歧义性，他们选择以“古文字本”作为该词的意涵。如冯登府（1783~1841）《三家诗异文疏证》中所有的注释均以毛诗所提供的古文字文本为原本，<sup>③</sup>陈乔枏（1809~1869）之《诗经四家异文考》对书写字体嬗变的考证完全以毛诗为参照系，他在分析“州”字时写道：

此毛氏古文也。加水旁坐洲乃今文俗体耳。<sup>④</sup>

① 陈奂在其《毛氏笺考征》中总结了郑玄对三家诗的运用：“笺中有用三家申毛者，有用三家改毛者。例不外此二端。”读者请参见陈奂《毛氏笺考征》，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第4169~4175页，注释中所引文字见于第4170页。

② James Highower, "The Han - Shih Wai - Chuan and the San Chia Shih,"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1 (1948): 241 - 310; Appendix 1, pp. 268 - 278, 此观点见于第264~265页。

③ 读者请参见（清）冯登府《三家诗异文疏证》，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第11011~11041页。

④ 读者请参见（清）陈乔枏《诗经四家异文考》，据湖北省图书馆藏清光绪刻本影印，第5781~5860页，文中所引字句见于第5781页。

最典型的例子是钱大昕将“古文字体”与篆书及楷书并列，视为魏朝三种石刻文字之一。<sup>①</sup>然而，隶属于不同诠释派别的经学家已将古文/今文之争上升至史学观的高度，甚至在训诂方法上也各自为阵，生发出对同一文本迥然相异的注释。

阮元（1764~1849）在其《毛诗正义》的前言“毛诗注疏校勘记”中介述了四家诗各自依据的原本以及训诂方法论上的差异，展现了《诗经》学在那一时期所显示的复杂历史面貌。阮元在此特地使用“古字”这一词义清晰的语汇，而非含混的、歧义丛生的“古文”，如下：

考异于毛诗经有齐鲁韩三家之异者。齐鲁诗久亡，韩诗则宋以前尚存。其异字之见于诸书可考者大约多古字，韩多今字。有时必互相证而后可以得毛义也。毛公之传诗也同一字而各篇训释不同，大抵依文以立解，不依字以求训。非执于周官之假借者不可以读毛传也。毛不易字，郑笺始有易字之列。顾注礼则立说以改其字而诗则多不欲显言之。<sup>②</sup>

训诂学的内涵与外延包括正字、正音、识别通假字与异体字以及规范书写，从而使读者能够准确地理解辞章段落的意涵。与阮元同时代、稍较阮元年轻的学者马瑞辰（1782~1853）曾深层

① 读者请参见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一字三字石经》卷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第504页。

② （汉）郑玄笺，（唐）孔颖达正义《毛诗正义·毛诗注疏校勘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1页。

次地解释训诂的原则：

毛诗为古文，其经字类多假借。毛传释诗，有知其为某字之假借，因以所假之正字释之者；有不以正字释之，而即以所释之正字之义释之者。说诗者必先通其假借，而经义始明。齐、鲁、韩用今文，其经文多用正字，经传引诗释诗，亦多用正字者，正可藉以考证毛诗之假借。<sup>①</sup>

不同文本表面上虽各有殊异，但藏匿于三家诗文本书写背后的口头传统却极其相似。细数陈奂、陈乔枏与王先谦等经学家对三家诗的整理、校对与编订，以及近代学者在出土简帛文献中寻得的证据，所有迹象都表明《诗经》的口头传诵文本完好无损地保留在了周人的记忆之中，再经由秦朝传至汉代。至于文字转录与书面文本的差异则主要在于字体的书写及正字法的运用上。换言之，四家诗所依据的口授文本是基本相同的，但他们择取的字体与书写形式各有千秋。<sup>②</sup>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同学派对《诗经》的诠释与应用就应该保持统一，但问题在于，若干个世纪以来，这种仅因字体与书写形式不同而带来的差异竟然造成了各家学派之间的隔阂与积怨，从而掩盖了文本背后

① (清) 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毛诗古文多假借考》，中华书局，2012，第2071页。  
② 读者请参见虞万里《从篆平线石和竹简〈缙衣〉看晋人四家〈诗〉研究》，收录于《剑桥斋学林》（两卷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第109～154页，正文所涉观点见于第119页；Martin Kern, "The Odes in Excavated Manuscripts," in Martin Kern, ed. *Text and Ritual in Early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5), pp. 149–193.

的一致性。<sup>①</sup>关于这一点，司马迁在《史记》中就曾提及，但未阐明清楚，后世的班固则对此做出了明确的论断：“其语颇齐鲁间殊，然其归一也。”<sup>②</sup>

① 关于作为物质的文字记录与作为精神的智性传播在信息学上的差异性，读者请参拙著《中国经学史》卷一第三节，“竹简著书与编订自由”，我的主要观点见Harold Roth, "Text and Edition in Early Chinese Philosophical Literature," *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3 (1993): 214–227.

译者注：

哈罗德·罗斯 (Harold Roth) 是宗教学专家，他在冥想研究方面颇有成果。他的学术兴趣广泛，在文本批评、版本学、神秘主义、道教以及中国传统地方等方面都有所建树，他在诸多跨学科领域中也做出了开创性之举。他曾在欧洲社会科学院教授保罗·汤普森的领导下撰写《淮南子的文本史》一书，之后撰写了《中国早期哲学文献的文本和版本》这一巨著。他试图重构战国末期和汉初的内省传统，曾写下《早期道家思想中的冥想与修养》、《早期道教史》与《庄子的内省》等著作，他将中国古代人的冥想称为“内心修养”。他深入地剖析了中国文化中的内修维度，并将宇宙论、心理学与政治学融为一体。他认为中国古代群体可被划分为个人主义者、原始主义者和混合主义者三类，他试图将神秘主义的神秘体验作为一种哲学分析方法运用于中国原始宗教，在他看来，老庄是静修养和原道的典范，为了将上述论点系统化，他专门撰写了《原道与静修：道教主义的基础》、《中国古代宇宙论与道家概念》、《神秘主义实践中的老子》以及《子》的神秘体验》等著述。1975年他参与了多伦多大学的一个关于早期哲学项目的，在参与项目的过程中对《淮南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认为《淮南子》作为综合性的文本详细介绍了几乎所有的知识领域，涵盖了宇宙学、天文学、哲学、政治学和军事学等诸多领域，他同时认为，虽然《淮南子》包罗万象，但根本，它的思想基础仍然是道教内修传统。项目结束后，他撰写了《淮南子的观念》、《淮南子的“原道”与“自然修养”》、《道家内心修炼思想与《淮南子》本结构》与《淮南子与早期道教》等一系列文章，他还与约翰·梅耶 (Major, 莎拉·奎因 (Sarah Queen) 等学者共同翻译了《淮南子》全本，将英本取名为《淮南子：中国汉初政府的理论与实践指南》。罗斯的学术研究和哲学结合了心灵哲学与脑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他将不少实验技术和数据报告运用到他的“沉思与冥想”研究之中，撰写了《沉思与冥想研究：新领域的展望》、《冥想与宗教教育》等多篇文章，试图将冥想推广至教育实践之中。罗斯担任了多种与宗教教育有关的职务，从1993年起开始担任中国宗教研究学会会长，并同时担任日本道教国际联合研究会会长。除此之外，他还是新英格兰中国思想研讨会 (1988–1993) 的联合主办人。

② (汉)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第3124页；(汉) 班固：《汉书》，书局，1962，第3613页。

“仇”为例，它们的字音相同，而当它们被看成单独的两个字，它们的字义可能相同，也可能相异。《诗经·国风·兔置》印了“逮”与“仇”在某种意义上的统一性，如“起起武夫，侯好仇”<sup>①</sup>这句话中的“仇”字也可替换成“逮”字，二者在处的意义相同。初唐学者孔颖达（574~648）注意到当此类字单独看待时，它们的发音是不同的，但他将此总结为“异音同”。<sup>②</sup>至少在上述所引诗句中，语音和语义达到了某种一致。

细读《关雎》一篇，我们亦可寻得这种一致性，如表4所示：

表 4-1 四家诗中的《关雎》

| 毛诗                        | 鲁诗 | 齐诗 | 韩诗 |
|---------------------------|----|----|----|
| 关关雎鸠                      |    |    |    |
| 在河之洲                      | 州  | 州  | 州  |
| zhou * tɕaw               |    |    |    |
| 窈窕淑女                      |    |    |    |
| 君子好逑                      | 仇  | 仇  | X  |
| qiu * gu                  |    |    |    |
| 参差荇菜                      | 惨  | 惨  | 惨  |
| cen * ts'am shan * ts'am  |    |    |    |
| xing * garu? yan * eljan? | 苻  | 苻  | 苻  |

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第3页。  
②（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第21页。

这种“归一”性显著地体现在《诗经·关雎》之中：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sup>①</sup>

毛诗保留了“逮”的古字，发音为“gu”，并将之释为“匹（匹配）”；鲁诗与齐诗则采用了与“逮”相谐音的“仇”字；郑玄在其笺注中亦使用了“仇”字，他解释道“怨偶曰仇”。由于郑玄的笺注以毛诗为本，故我们可以合理推断，或许毛诗最初的原始文本也采用了“仇”字，而非“逮”。<sup>②</sup>逮/仇之辨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此类字词究竟是异体字还是异义字。也就是说，仅仅是字形产生了变化，还是连同意一道生成了变化？<sup>③</sup>鲍则岳（William G. Boltz）认为，此类辨析是文本批评的重要任务。<sup>④</sup>以“逮”与

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正义《毛诗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20页。  
② 读者请参见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为湖湘文库丛书之一，岳麓书社，2010，第26页。郑玄并非毛学的忠实跟随者，他在注解《诗经》时，海纳百川，博采众长，将其他三家学说信手拈来，故我们不应把郑玄对《诗经》的诠释理所当然地视为那是毛学的映射，请读者在做出判断之前停顿思索片刻。  
③ 读者请参见 William G. Boltz, *The Origin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 (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94), pp. 158-167; William G. Boltz, "Textual Criticism More Sinico," *Early China* 20 (1995): 393-405.  
译者注：  
[美] 鲍则岳 (William G. Boltz)，于1965年、1969年、1974年分别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方语言学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现任教于华盛顿大学，担任亚洲语言和文学系教授。他曾与迈克尔·夏皮罗 (Michael C. Shapiro) 共同撰写《亚洲语言历史语音学研究》 ("Studies in the Historical Phonology of Asian Languages")，刊载于《语言学理论当下话题》 (*Current Issues in Linguistic Theory*)，约翰本杰明出版公司，1997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77)。  
④ 读者请参见 William G. Boltz, *The Origin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 (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94), p. 106。

典型例证，如表 4-2：

续表

| 毛诗                  | 鲁诗 | 齐诗 | 韩诗 |
|---------------------|----|----|----|
| 左右流之                |    |    |    |
| 窈窕淑女                |    |    |    |
| 寤寐求之                |    |    |    |
| 求之不得                |    |    |    |
| 寤寐思服                |    |    |    |
| 悠哉悠哉                |    |    |    |
| 辗转反侧                |    |    |    |
| 参差荇菜                |    |    |    |
| 左右采之                |    |    |    |
| 窈窕淑女                |    |    |    |
| 琴瑟友之                |    |    |    |
| 参差荇菜                |    |    |    |
| 左右芼之                | X  | X  | 视  |
| mao * maw yan * maw |    |    |    |
| 窈窕淑女                |    |    |    |
| 钟鼓乐之                |    |    |    |

文本的韵律是显而易见的，“荇”“芼”二字自然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字，除非它们在字形上的相似可以说服我们把一个字符视为另一个字符的视觉变体，从而忽略语音上的差异。这首诗中的变体皆为字形变体，而《诗经·小雅·甫田》<sup>①</sup>则是语音变体的一个

① (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第14页。

表 4-2 四家诗中的《甫田》

| 毛诗          | 鲁诗 | 齐诗 | 韩诗                                 |
|-------------|----|----|------------------------------------|
| 倬彼甫田        | X  | X  | 藟/藟<br>dao * tog/<br>圃<br>pu * pwo |
| dao * tōk   |    |    |                                    |
| fu * pi-wa  | X  | X  |                                    |
| 岁取十千        |    |    |                                    |
| 我取其陈        |    |    |                                    |
| 食我农人        |    |    |                                    |
| 自古有年        |    |    |                                    |
| 今适南亩        | X  | 芸  | X                                  |
| 或耘或耔        |    |    | yun * giwan                        |
| yun * giwan |    |    |                                    |
| zi * tsiaŋ  | X  | 籽  | X                                  |
| 黍稷薿薿        |    |    | zi * dz'iaŋ                        |
| yi * ngiaŋ  | X  | 振  | X                                  |
| 攸介攸止        |    |    | ni * ngiaŋ                         |
| 烝我髦士        |    |    |                                    |

关于“倬”与“藟/藟”的交替使用，许慎曾将“藟”解读为：“草木倒，从草到声。”桂馥(1736~1805)则将之视为错误的论断，他根据《尔雅》、《经典释文》及《广韵》中的注释，得出

中国经学史·秦汉魏晋卷：经与传

如下结论：“草大也。”<sup>①</sup>桂馥的这一定义鲜为人知，却更接近原义，章太炎将他的某本著作命名为《荀汉三言》，<sup>②</sup>显然章氏认同桂馥对“荀”的解释，倘若将“荀”释为倒，那么此书之名就神秘不可知其义了。依据章太炎的家学传统及其门生的回忆，章氏将“荀”念为 zhuo，而毛诗则将“倬”念成 dao，这便是语音的交替性变体形式。郝懿行（1757~1825）认为“倬荀音义同”。<sup>③</sup>他较早地认识到“卓”与“倬”同，也就是说“倬”、“荀”与“卓”是异体而同音同义的一组单字，但当时的人们似乎不太认可他的观点，因此仍然将之视为完全不同的汉字。王念孙（1744~1832）认为“卓”与“倬”可以互相替换使用，但他提出“倬”在字义上等同于“灼”，也就是光明。<sup>④</sup>倘若王念孙对这个字的字源推断正确，那么这便是此诗出现的首个语音变异字。

另一组例子则是“甫”与“圃”。一些学者认为语音和字形上的相似暗示了语义之间的关联，而郑玄则对“甫”进行了如下解释：“甫之言丈夫也。”这代表了他对古老的农业税收制度（政府对耕作于田地之上的男性农民征税）的赞同。<sup>⑤</sup>郑玄认为这种词义的扩展与变迁从本质上而言是词语自身所具备的特征。需要注意的是，在上述所引之诗剩下的三小节中，只有一个例子是关于文本/词义变迁的。聚焦于第二小节，毛、齐两家所认读的

①（清）桂馥：《说文解字义证》，中华书局，1998，第72页。

② 章太炎：《荀汉三言》，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三言”即“荀汉微言”、“荀汉昌言”与“荀汉雅言割记”。

③（清）郝懿行疏《尔雅义疏》，《汉小学四种》（两卷本），巴蜀书社，2001，第892页。

④（清）王念孙：《广雅疏证》（附索引），中华书局，2004，第4~7页。

⑤（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第14页。

“御”与鲁氏所认读的“迎”可以相互替换。

《诗经·小雅·甫田之什》（与《诗经·小雅·北山之什》和《诗经·小雅·桑扈之什》并列）中的九首诗表露了这种微小的文本变异，合计23处，其中只有4处（亦即17%）是纯粹词语意义上的，这4处主要是通过同义性的文本转录来传达另一个词语所内含的信息。我们可在《诗经·周南》的前11首诗中找到35处文本变异，值得玩味的是，没有一处是单纯词语性变异。《清庙之什》中得出的数据也反映了相似的结果，这组诗共计4%的文本变异，词语性变异只占据全部变异的3.8%。通过对《诗经》的取样分析，我们不难得出以下结论：词语性变异的惊人缺乏暗示了词语的内涵及外延与正字法所揭示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趋于统一。

但这种统一并不意味着正字法本身会趋于一致，更不能使各家独立学派的训诂解释相统一。例如，毛派的宗旨是歌颂周朝统治及后妃之德，因此毛诗“小序”是针对皇后和其他王公贵族所书，如下：

后妃之德也……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关

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sup>①</sup>

与之相反，鲁学与跟随其后的齐、韩二学则力推“刺诗”之

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第18页。

说，<sup>①</sup>《汉书·杜钦传》载：“钦言：作关雎之人，叹在上之好色无度，冀得淑女配君子也。”据考证，杜钦乃鲁学后生。<sup>②</sup>

据《汉书》记载，杜周曾言：

后妃之制，天寿治乱存亡之端也。迹三代之季世，览宗、宣之谗国，察近属之符验，祸败喝常不由女德？是以佩玉晏鸣，关雎叹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离制度之生无厌，天下将蒙化，陵夷而成俗也。故咏淑女，几以配上，忠孝之笃，仁厚之作也。<sup>③</sup>

旨在揭露性欲放纵之恶。

以上针对淫乱行为发出的警告，以及对于淫乱所导致的生理后果之揭示，影响了自周代晚期至汉代萌生并发展的某种另类诠释学派。此类诠释观念发源于《荀子》，兴盛于楚国，柯马丁

① Martin Kern, "Beyond the 'Mao Odes': Shijing Reception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27 (2007): 131-142; Mark Laurent Asselin, "The Lu-School Reading of 'Guanju' As Preserved in an Eastern Han Fu,"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7 (1997): 427-443.

译者注：

马科·劳伦特·艾塞林 (Mark Laurent Asselin) 著有《富含意义的年代：蔡邕和他的同代人》(A Significant Season: Cai Yong and His Contemporaries)，美国东方学会，2010 (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2010)。他自攻读硕士学位起就开始专注于蔡邕研究，他的硕士学位论文是《〈后汉书〉中的“蔡邕传记”》(华盛顿大学，1991，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91)，攻读博士学位时将研究视界扩大至与蔡邕同时代的其他学者，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是《一个时代终结之处的文学：蔡邕和他的同代人》(华盛顿大学，1997，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97)。他对《诗经》也颇感兴趣，曾撰写《从汉赋中保留的篇章看鲁氏对〈关雎〉的解读》一文。

② 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湖南文库丛书之一，岳麓书馆，2010，第21页。

③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第2669页。

(Martin Kern) 曾在其《毛诗之外》中引介当时新兴的独立学派，如下：

另一种全然不同于毛派传统的《诗经》阅读法悄然兴起，我们可在最近出土的两种竹简手稿——湖南长沙马王堆之“汉代早期五行”与“战国晚期孔子诗论”中见出端倪。此二者皆可追溯至公元前300年，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它们都传达了“以/由色谕于礼”的观念。<sup>①</sup>

对清代经学方法论的严重质疑意味着学者们试图重构诗三家各自所依据的文本，而问题的特别之处在于，如何还原一种古文字体向另一种古文字体的转换。我曾在前文对《诗经》做过数据分析，指出文本信息与转录文字之间存在统一性。当然，我们也可消极地看待这些数据以及所关涉的方法论，将之视为某种妄图以残缺的书面遗骸为基础而重建早期文本传统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可被认为是存在漏洞而薄弱的。高本汉 (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 曾对清代考据学的局限性进行过一些批判，他指出清代考据学在处理文本上存在三个缺点：首先，清代的经学家缺乏古汉语音韵学方面的知识及其相关的语言学方法论；其次，清代的经学家过分地依赖释读古汉语的词典，而那不过是文

① Martin Kern, "Beyond the 'Mao Odes': Shijing Reception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27 (2007): 135; Jeffrey Riegel, "Eros, Introversion, and the Beginnings of Shijing Commentary,"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7 (1997): 143-177.

考据学最严重的问题。<sup>①</sup>

这种推理导致的典型谬误即为，假定某种“师法”以铁腕政策统治了汉代的经学研究。以上误判为后人造出一个刻板而真实的印象——所有受制于“师法”学术谱系的门生，无论其“大师”有过正式还是非正式的接触，都阅读了相同的文本，并接受了相同的训诂学训练。陈乔枞曾言：

汉书匡衡传引诗曰君子好仇。衡治齐诗，与翼奉萧望之同师，是所引为齐诗。<sup>②</sup>

陈氏在此处提及的儒生大抵确实皆拜于西汉经师后仓门下，《汉书·匡衡传》中关于匡衡引用并运用齐诗的例子也可能确为史实，但具体的细节则不得而知。

将源语逐一分配至转录性/变体性文本的难度系数极高，一个突出的例子便是前文所引证的《诗经·小雅·甫田之什》。学术界普遍认为“圃”的转写及变体隶属于汉代书写传统，但被视作正统的毛诗却坚持将“甫”念作fu，而非pu，显然毛学并不赞成“圃/甫”二字的通用。尽管郝懿行与朱骏声这两位学者全盘接受了毛学的观点，但在前文提及的“藟/倬”问题上却与毛学相左。<sup>③</sup>在现存的文本传统中，面对自相矛盾的证据时，将某个

<sup>①</sup> James Hightower, "The Han - Shih Wai - Chuan and the San Chia Shih,"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1 (1948): 241 - 310, 此观点见于第 252 页。

<sup>②</sup> 陈乔枞：《毛诗郑笺改字说》，中华书局，1995，第 5766 页。

<sup>③</sup> 郝懿行疏《尔雅义疏》，《汉小学四种》（两卷本），巴蜀书社，2001，第 8 页；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中华书局，1984，“小部”，第 45 页。

字注释的集合，却忽略了早期文本内在的相似性；再次，清代经学家不论早期文本注释的价值，对其毫无保留地全盘接受，因此，他们自身对经典的诠释模仿有余而创新不足，缺乏带着批判性思维的独立思考。<sup>①</sup>高本汉 (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 的见解言之有理，但忽略了清代考据学家在研究三家诗过程中的致命缺陷，即根据某些晚近的评价或清人自己的逻辑推理将某些由转录生成的文本变异判归于此学派或彼学派之下，这才是清代

<sup>①</sup> Bernhard Karlgren, *Glosses on the Book of Odes* (Göteborg: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1964), pp. 81 - 83.

译者注：

【瑞典】高本汉 (瑞典语：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 1889 年 10 月 15 日至 1978 年 10 月 20 日)，出生于瑞典延雪平，16 岁时即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内容是关于达拉纳省的方言。其后，他于 1907 - 1909 年就读于乌普萨拉大学，成为比较音韵学专家斯拉夫教授伦德 (J. A. Lundell) 的学生、主修德语，并立志将比较历史音韵学的方法应用于当时还没有人以此方法研究的中文上。由于当时的瑞典还没有人教授中文，他便前往圣彼得堡，跟随文瓦诺弗 (A. I. Ivanov) 教授学习了两个月。他于 1910 - 1912 年在中国研究汉语及方言，返回欧洲后他开始以法语撰写博士学位论文。1939 年，他接替考古学家乔汉·古纳·安德森 (Johan Gunnar Andersson, 1874 - 1960) 成为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 (瑞典语：Östasiatiska Museet；英语：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的馆长，直至 1959 年。此公共博物馆于 1926 年建立，收藏了安德森于 19 世纪 20 年代在中国进行史前考古时的发现，其后博物馆亦收藏较晚期的文物以及亚洲其他地区的考古文物。高本汉与安德森多年来一直保持紧密的学术联络，他接替安德森的工作之后同时担任博物馆馆长编辑，直至 19 世纪 70 年代。他在年刊上刊登了自己大部分的重要著述，并以书籍的形式出版博物馆的专题论文系列。自 1946 年起，高本汉开始猛烈抨击当时学者对中国古代史料粗浅的编辑方法，他认为时人对中国史料的处理极不严谨，存在诸多问题，甚至有一些学者在重构中国古代史时毫无选择性地采用不同年代的文献，他对此表示出强烈的反感和斥责。作为第一位使用历史语言学研究中古汉语及上古汉语的学者，他比较了部分双字在日语中的训读以及在吴音、粤音和普通话中的读音，还重构了中古汉语及上古汉语的语音。他认为早期中文的人物代名词有变格的情况，指出上古汉语有复辅音，并构拟出 13 组复辅音出来。他所著的《中国上古汉语语音纲要》与《中国音韵学研究》都是重要的研究成果。

转录性/变体性文本列入某个学派门下是武断的。况且，王先谦提供的证据显示，不同版本的鲁诗在流传过程中相互抵牾。<sup>①</sup>虞万里曾悉心研究鲁诗，他综合比较了清人的历史性分析、竹简《缙衣》手稿以及采用鲁学注释刻印而成的熹平石经，认为只有35%的文本符合清人的推断。<sup>②</sup>这一研究成果揭露了清代经学家在试图对诗三家的训诂传统进行重建过程中所存在的重大缺陷。

鉴于上述这些大量的证据表明大部分异文并不指向具体的词语，而只是关涉具体的书写形体，故我们完全可以假定《诗经》中所有的诗篇皆为周人口耳相传而流播至秦汉，各学派依据所得之文本加以灵活地诠释，因此呈现复杂的历史样貌。关于这一点，柯马丁（Martin Kern）曾详细阐释当时的文本形态，如下：

尽管齐、鲁、韩、毛四家诗存在文本上的差异，但我们不难发现它们整体上的共通性。这与出土文献中大量的文本变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无法推断所存残篇背后的规范文本形式，或言最原始的文本形式。出土的残篇很可能以其余三家诗传统为主，而东汉晚期的训诂方法则以毛学为正统，依照当时的情况，其余三家的后学也许根据毛学进行了调整，而它们早先的文本呈现形式则与毛诗形成了较大的差异。看来，唯有出土的竹简给我们以启示，它暗示了相互之

间彼此独立的诗篇传授可能发生于战国晚期以及汉代早期。

柯马丁（Martin Kern）指出，这些早期手稿中文本变化的例远甚于三家诗传统中的文本/词汇变体，前者达到31.40.6%，而后者仅有2.2%~7.6%。<sup>③</sup>一种合理的解释是，时期各地的字体各不相同，而且处于流变之中，秦代的字体于统一，最终生成了固定的书写形体。

柯马丁（Martin Kern）对《诗经》的各种文本形态进行研究，包括过去四十年出土的简帛，结果发现与他之前关于毛学影响的研究成果相互抵触，因为绝大多数的文本变体手明产生变异的只是字体形态，而非词语本身。<sup>④</sup>这意味着在晚期一种规范化的诗歌文本已然流传开来，人们对词语所传信息也已达成共识，只是外在的书写形态因人因地而异。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是毛学传统对汉代书写及记录传统产生了性的影响，从而使文本记录方式与所欲传达内涵趋于和谐。

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在于，探讨四家诗的传统是否在汉代有效地吸收并接受。文本信息的一致性掩盖了以下事实：一派对同一文本的注释，或言对相同词语的训诂取决于其所坚政治观与道德观，正是这种基本观念上的差异导致了彼此之

① Martin Kern, "The Odes in Excavated Manuscripts," in Martin Kern, ed. *Text and in Early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5), p. 152.  
② Martin Kern, "The Odes in Excavated Manuscripts," in Martin Kern, ed. *Text and in Early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5), p. 156.  
③ Martin Kern, "The Odes in Excavated Manuscripts," in Martin Kern, ed. *Text and in Early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5), p. 175.

① 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湖湘文库丛书之一，岳麓书院，2010，第800、805、1041页。  
② 虞万里：《从熹平残石和竹简〈缙衣〉看清人四家〈诗〉研究》，收录于《榆枋斋学林》（两卷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第154页。

相径庭的诠释流派之诞生。换言之，各家所持存的价值观奠定了其诠释传统之根基。

显然，如何将口授过程中流传下来的信息与《诗经》的文本转录相整合是辕固和申培的燃眉之急，而关涉到异体字辨识的正字法却不被早期的经学家重视，除韩婴一人之外，我们可在其《韩诗内传》中窥见端倪。

## 结 论

清人江藩曰：

汉兴，儒生据摭群籍于灰烬之余，传遗经于既绝之后。

厥功伟哉。<sup>①</sup>

江藩怀揣着如此的感伤，叹息后世学者亏欠于汉代经师。钱大昕则更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这种情感：

曾子子思之微言所以不终坠者实赖汉儒荃萃之力。<sup>②</sup>

谈及《尚书》，后人亏欠于孔安国、伏生、欧阳生以及大小夏侯，正是他们保存、编辑并传播了真正的经典，功绩应归于他们。最重要的是，他们以经典诠释这一巧妙的方式及其智性的表

① (清) 江藩：《宋学渊源记》，《万有文库荟要》，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第1页。

② (清)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163～164页。

达参与了历史的进程，他们成为中国政治思想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成就了那个时代的律法和政策。至于四家诗派，他们对《诗经》的转录与评注使这部经典名著得以保存，并丰富了国人的语言、修辞及审美趣味，其贡献之大不可估量。最后可见，口授与转录——此双重媒介在文本传递过程中起着各自的作用。